

毛氏父子对《三国志演义》的“比类而观”及其“重复”理论的现代意义*

李桂奎

摘要:毛纶、毛宗岗父子凭着“比类而观”对《三国志演义》之“重复”叙事进行了较全面的识辨和阐释,提出了“相反而相因”“不相反而相因”“相类而相因”“不相类而相因”等相互关联的形态,我们可将其归纳为“相类而相似”“相类而相异”“相类而相反”三种。在毛氏父子看来,这三种“重复”叙事形态能够涉笔成趣,既拥有“遥遥相对”“遥相呼应”等结构功能,又具备“相映”“变化”“奇妙”等审美效果。另外,毛氏父子也能从因果观念上对小说“重复”叙事的衍生意蕴予以阐释。较当今由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家米勒提出而风行于西方的“重复”等理论,毛氏父子的“重复”理论早了数百年,期待通过整合、激活以发扬光大。二者在源于各自传统、立足于经典文本、重视结构功能等方面可以形成跨时空镜照。我们应通过取长补短使之服务于当今中西合璧的文论建设。

关键词:比类而观;类似;重复;结构之妙;叙事理论;镜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173-09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17.02.017

作者简介:李桂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古往今来,文学文本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重复”,这些“重复”要么发生于后文本与前文本之间,是为文本间际“重复”;要么出现于同一文本内部,是为文本内部“重复”。面对文学文本内外之“重复”,中外学人常常通过文本对比或比对以求其似、掘其异、得其反。当今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H.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1982)一书中所提出并阐发的“重复”理论正是这种研究路数的概括和总结。反观中国文论本身,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清代初年,受金圣叹“犯而后避”等理论观念的影响,毛纶、毛宗岗父子即在《三国志演义》评点中通过“比类而观”(第一百二十回评语)去识辨这部小说文本内外之“重复”,尤其是对这部小说文本内部所存在的大量因袭片段进行了发掘,并以“相似”“相映”“相类”“亦如”以及“仿佛相似”“一般意思”“亦复相似”“正复相类”“遥遥相对”“前后一辙”“相互映像”等术语评之,初步形成了一套中国古典的“重复”叙事理论。^①

收稿日期:2016-07-15

*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传统小说互文性研究”(项目编号:NCET-12-09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毛氏父子所谓“相类”“相似”,意思其实就是“重复”。在针对“重复”叙事文本评点时,毛氏父子也偶尔直接用“重复”一词。如在第四十六回“总评”说:“孔明掌中之字,与周瑜掌中之字,不约而同,此合掌文字也;又参之以黄盖之言,是三人之文,皆为合掌矣。孔明新野之火,与博望之火,大同小异,此重复文字也;又将继之以赤壁之火,是一人之文而三番重复矣。然必文如公瑾,方许其合掌;文如孔明,方不厌其重复。每怪今人作文,动手便合,落笔便重,彼此只是一般,前后更无添换,即何不取周瑜、孔明之文而读之耶?”在毛氏父子看来,只要像《三国志演义》叙述周瑜、孔明故事那样注意“添换”文笔,即使是“重复文字”,同样也可做出精彩的好文章。由此可见,毛氏父子的“比类而观”方法及其所形成的理论完全能够与米勒的“重复”叙事理论进行对话,故而也可径称为“重复”理论。

此“重复”叙事理论堪与米勒“重复”叙事理论形成跨时空对话和镜照。

一、毛氏父子对《三国志演义》文本的“比类而观”

由于《三国志演义》规模宏大,所叙之事“多”而“杂”,因此在文本内部易出现各种叙事片段的“因袭”,或叙事框架雷同,或叙事语气乃至用词相似。对此,毛氏父子常以“比类而观”眼光予以识辨,并在第九十四回的回前总评中将这许多“相重复”的片段分为“相反而相因”“不相反而相因”“相类而相因”“不相类而相因”四种。为避免交叉,我们不妨将“不相反而相因”与“不相类而相因”整合归并为“相类而相异”。于是便可简化为“相类而相似”“相类而相异”“相类而相反”三种类型。

且看,毛氏父子关于“相类而相似”叙事文本的评批,这类评批大多以直接指出小说文本的“相似”这样的形式出现。如第四十一回写赵云的马陷入土坑,在张郃“挺枪来刺”的危急时刻,“那匹马凭空一跃,跳出土坑”。对此,毛宗岗父子评曰:“与玄德檀溪跃马仿佛相似。”回看第三十四回所叙述刘备被蔡瑁加害而追杀,情急之中所发生的“檀溪跃马”脱险一幕,其叙事情景的确非常相似:“那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玄德如从云雾中起。”据统计,仅被直接鉴定为“仿佛相似”的叙事片段就有十八处,更遑论尚有多处以“相似”“仿佛”“前后亦复相似”“前后正复相类”等术语评之。尤其是从近半部分的第四五十回之后,“仿佛相似”以及“相似”的“重复”叙事出现的频率和密度自然会越来越大,到最后几回乃至陈陈相因。如在第一百十三回,毛氏父子一再提示“与诸葛恪家黄犬衔衣,孝子入门之怪,仿佛相似”“与诸葛恪入朝时仿佛相似”“与诸葛恪饮酒时仿佛相似”“令人追想孙峻杀诸葛恪时”,指出此述孙琳之死与前述诸葛恪之死的相似性印象。毛氏父子“瞻前顾后”,不仅指出后文本与前文本相似,还指出前文本与后文本相似。如第三十九回总评指出:“文有余波在后者,前有玄德三顾草庐一段奇文,后便有刘琦三求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作波在前者,将有孔明为玄德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为刘琦画策一段小文是也。”再如,针对第八十八回所写“(马)岱领着二千壮军,令土人引路,径取蛮洞运粮总路口夹山峪而来。那夹山峪,两下是山,中间一条路,止容一人一马而过”数语,毛氏父子评曰:“与后文邓艾渡阴平岭仿佛相似。”经核查,其相似处是第一一七回所写的下列内容:“自阴平进兵,于巖崖峡谷之中,凡二十余日,行七百余里,皆是无人之地。魏兵沿途下了数寨,只剩下二千人马。前至一岭,名摩天岭,马不堪行。”此段文字写窄道险境,的确与前文颇为相似。又如,针对第九十回所写“孔明将柜打开,皆是木刻彩画巨兽,俱用五色绒线为毛衣,钢铁为牙爪,一个可骑坐十人”几句,毛氏父子评曰:“与后木牛流马仿佛相似。”经比照,其对应段落是第一〇二回所写“众大喜,孔明即手书一纸”云云。面对这种“相类而相似”的“重复”,毛氏父子除了直接运用“仿佛相似”之类的评语去评说,还间或以“前后如出一辙”“遥遥相对”等术语来评点。如第一一六回针对小说所叙“姜维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黄皓隐匿,因此误了大事”数语,毛氏父子评曰:“与张让隐匿黄巾消息前后一辙。”经这一提示,人们便更容易由这里所叙黄皓误国这样的雷同一笔联想起小说第一回所叙张让祸国之事,这里的“相类而相似”叙事几乎跨越了整部小说,带有首尾遥相呼应性质。总之,面对小说所出现的如此众多“相类而相似”叙事,毛氏父子往往是既提示读者留意其来路,又启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联想回味整部小说的叙事机趣,重点突出了其“相映成趣”美感。当然,毛氏父子尽管对各种“重复”叙事特别敏感,但也没有做到一网打尽。如第八十四回写道:“陆逊回寨,叹曰:‘孔明真卧龙也,吾不能及!’”于是下令班师。”第九十九回写道:“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长叹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没之计,吾不能及也!’”于是司马懿留诸将在寨中,分兵守把各处隘口;懿自班师回。”前后两段写人物声情之“相类而相似”,毛氏父子却未能指出。

其实,就小说的前后叙事文本而言,“似”只是相对的,“异”才是绝对的。同而有异,犯而求避,才是中国式“重复”叙事的基本规律。接下去我们看毛氏父子对“相类而相异”叙事文本的评批。在具体操作中,毛氏父子往往先指出其前后文本“遥遥相对”之“相因”,继而再用“然”“但”等转折词强调其“异”。如第十九回写吕布打侯成,“众将又哀告,打了五十背花”。对此,毛氏父子评曰:

“与张飞打曹豹一样打法,但打曹豹的是醉棒,打侯成的是醒棒。”回看第十四回写道:“(张飞)将曹豹鞭至五十,众人苦苦告饶方止。”的确,这两段文字写教训属下方式所采取的“打”及其数量和旁观者替挨打者求情告饶,是相似的,然而由于打者与被打者脾气不一,情景又有分别,前之动机和后之效果又自然不同。再如,第九十一回针对“孔明自引大军回成都。后主排銮驾,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辇立于道傍,以侯孔明”几句,毛氏父子评曰:“与献帝迎曹操相类,而君之诚伪既殊,臣之忠奸亦别。”此述后主迎接诸葛亮,与前述汉献帝迎接曹操,虽然皆为国君迎接臣子,但一出于对“忠臣”的真诚,一出于对“奸贼”的不得已应付。相类而又相犯,这就是毛氏父子所反复指出的“相类而相异”。与评点“相类而相似”之“重复”多针对具体行文而言,关于“相类而相异”之“重复”的评批大多出现在“总评”中,采取的多是“以例释义”的方式。如第三十二回的“总评”就两次指出小说行文中所出现的“相类”而又“极不相类”的情节:“曹操决漳河以淹冀州,与决泗水以淹下邳,前后两篇大约相类。然用水于南境不奇,用水于北境为奇;淹下邳之计出于曹操之谋士不奇,淹冀州之策即出于袁氏之旧臣为奇。”指出小说所叙两次水战——决漳河淹冀州与决泗水淹下邳的异同。继而又指出:“侯成以献酒被责而降曹,冯礼亦以饮酒被责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于决水之后而不死,一降于决水之后而随死,则大异。魏续为友人抱愤而献门,审荣亦为友人抱愤而献门。献门同也,而吕布在城中而被执,袁尚在城外而未擒,则又异。就其极相类处,却有极不相类处,若有特犯之而又特避之者,真是绝妙文章。”这里既一一数落了“被责降曹”“抱愤献门”之同,又指明故事所发生的具体情境与人物结局之“异”,并将其定性为一篇“犯而求避”的好文章。这一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如第九十四回:“平蛮之后,又有平羌;藤甲之后,又有铁车。一则在于未伐魏之始,一则间于既伐魏之中;一则炎天,一则雪地;一则出其全力持之旷日,一则施以小计定之终朝。或详或略,或长或短,事不雷同,文亦不合掌,如此妙事,如此妙文,真他书之所未有。”为文之道,讲究的是“变化”而不是“雷同”,注重的是“犯而求避”,而不是“照葫芦画瓢”。在关于“相类而相异”叙事评批中,毛氏父子特别强调“重复”中的“变化”美。

说起来,“异”已意味着不同,而“大异”则演化为“相反”。换言之,“相反”是作为“相异”的特殊情况存在的。除了众多正向或同向“相类而相似”式的叙事,《三国志演义》还含有大量反向或逆向的“相类而相反”叙事文本。下面我们看看毛氏父子的相关评批。相对而言,要辨识出“相类而相反”叙事较为困难,但毛氏父子同样做到了慧眼识辨。如第四十八回“总评”说:“事有与下文相反者,又有与下文相引者。如操之临江而歌,瑜之触风而倒,此与下文相反者也;刘馥以乌鹊之咏为不祥,周瑜以黄旗之折为预兆,此与下文相引者也。不相反则下文之事不奇,不相引则下文之事不现。可见事之幻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这里突出了“相类而相反”叙事的“奇”效。再如,第四十七回有评曰:“阚泽见曹操,先激而后谏;庞统见曹操,先谏而后讽。又妙在相类而相反。”说的是“相类而相反”式的叙事可以形成比照效果。又如,第五十七回“总评”指出:“孔明吊公瑾之后,忽然遇着庞统,与庞统见曹操之后,忽然遇着徐庶,正复相似。前是将徐庶放去,此是将庞统引来。一样文法,两样局面,真叙事妙品。”还有,第七十一回有评曰:“张飞在长坂桥边,以树枝结于马尾,妆作有兵之状;今赵云偏反作无兵之状,妙在极相类又极相反。”这些评批指出了“相类而相反”叙事所形成的“一样文法,两样局面”等叙事变换之妙。

由以上可见,毛氏父子的“重复”叙事理论对各种形态既有所区分,又多有统筹。“相类而相似”含有“相类而相异”因素,“相类而相异”又包含“相类而相反”,三者因“相类”而引发读者关于前后文的阅读联想。

二、毛氏“重复”理论突出“相映成趣”审美效果

毛氏父子在关于“重复”叙事的评点中,总是喜欢落实到“趣”字,或谓“相映成趣”,或说“映像成趣”,或称“相对成趣”。

具体而言,毛氏父子首先看重的是小说结构上的“相映成趣”。如《三国志演义》第三十四回有

这样几句原文:“原来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曹操平日最爱之。”对此,毛氏父子评曰:“前文叙袁绍爱少子,后文叙刘表爱少子,此又叙曹操爱少子,正与前后相映照。”指出这几句叙述语所隐含的军国大事与家庭琐事之间的特殊逻辑关联。与第三十一回前叙袁绍因溺爱少子而贻误军机以及与随后第三十四回所叙刘表因爱少子而导致祸起萧墙等叙事构架大致雷同,因而给读者以“相映照”之感。再如,第六十二回有这样一段叙述:“黄忠大怒曰:‘汝说吾老,敢与我比试武艺么?’”这里叙述的是,黄忠和魏延两人本来同为韩玄手下,后来共事刘备。在攻取雒城之战前,两人争功,黄忠提出比试了断,庞统出面调停,并予以分工。在攻打雒城过程中,魏延虽立下战功,但因违犯军令,险些丢命,幸得黄忠相救。事后,刘备令魏延答谢黄忠救命之恩,并警告他们今后再也毋得相争。对此,毛氏父子评曰:“此处黄忠欲与魏延比试,后文关公欲与马超比武,前后相映。”与这段叙述构成映照关系的是第六十五回所叙故事:马超投诚刘备后,关羽得知其武艺超群,就给刘备、诸葛亮去信表示要入川与马超比武,诸葛亮回信予以劝转。再如,第八十六回所叙一段文字更是接二连三地通过行文“相因”这一手段与前文构成层层映衬。兹节录一段小说原文与毛宗岗父子评语(用中括号标示)如下:

及至天晓,大雾迷漫,对面不见。【既写月黑,又写雾天。与曹操舞榭之月,孔明借箭之雾,前后闲闲相映。】……文聘跳上龙舟,负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马报:“赵云引兵出阳平关,径取长安。”【与曹操在赤壁时闻马腾消息,一虚一实,前后又闲闲相映。】^①

此段所叙“破曹丕徐盛用火攻”,不仅从总体构思和整体命意上,而且具体细枝末节,分别与第四十六回所叙“用奇谋孔明借箭”、第四十八回所叙“宴长江曹操赋诗”以及第四十九回所叙“三江口周瑜纵火”、第五十回所叙“诸葛亮智算华容”等许多叙述单元如出一辙,含有诸多层面的行文“重复”。对这种常常跨越几回或数十回篇幅前伏后应的“重复”叙事,毛氏父子每每以“前后闲闲相映”“前后又闲闲相映”等评语来强调其审美效果。另如,第八十一回写道:“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将奋然出曰:‘留下印与我!’视之,乃关兴也。”对此,毛氏父子评曰:“二人争印,与许褚、徐晃争袍,遥相映照。”第一一九回写道:“会曰:‘来日元宵佳节,故宫大张灯火,请诸将饮宴。如不从者尽杀之。’”对此,毛氏父子评曰:“董承与吉平饮宴亦是元宵佳节,至此已隔九十余回,忽然相映。”其他如此含有映照性结构效果的“重复”叙事不胜枚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三国志演义》的“重复”叙事往往跨越多个回目,因而毛氏父子将其认定为“遥遥相对”“遥遥相映”或“相对而成篇”。如第二十回“总评”指出:“前有谋诛宦豎之何国舅,后有谋诛奸相之董国舅,遥遥相对。然二人不可同年而语矣。”说的是,该回所叙国舅董承对曹操实施诛奸,与第二回所叙国舅何进对董卓诛奸情节相似,颇具遥相呼应意味。有的是“相类而相似”式的“遥遥相对”。如第六十四回评曰:“张鲁欲婿马超而不果,与袁术欲婚吕布而不遂,前后遥遥相对。”回头看第五回不难发现,小说叙述的是李傕为董卓之女请求与孙坚之子结亲,被孙坚拒绝。前后两回都叙述求亲、议亲而遭拒,自然构成“遥遥相对”格局。再如,第一百一十五回总评指出:“先主将入西川,先见孔明画图一幅,又得张松画图一幅;司马昭将取西川,先见邓艾沓中画图一本,又得钟会全蜀画图一本。前后天然相对,若合符节,真奇文奇事。”有的是“相类而相异”式的“遥遥相对”,如第一百一十八回之总评也指出:“武侯初死,有杨仪、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钟会、邓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遥遥相对。然邓艾之表,未尝讦奏钟会,则邓艾与魏延异矣;魏延之表,未尝为杨仪所更易,则钟会与杨仪异矣。且一在班师之日,一在克敌之初,其势既殊,其事亦别,令人耳目一新。”在第五十一回的“总评”中,毛氏父子进而辨析了吕布赚曹操、曹仁赚周瑜、周瑜赚曹仁、曹操赚吕布等“重复”叙事的“不同中又有不同处”“相同中更有不同处”,并赞美其为“真叙事妙文”。在军事角逐中,指挥官们往往采取“赚取”策略,然而对于同一个“赚”字,在作者笔下却是“赚”法不一,“赚”果各异,从而既彰显出其“重复”之魅力,又彰显出其“相异”之别

①(明)罗贯中著,(清)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三国志演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65-966页。

趣。对此,毛氏父子深谙个中三昧。另外,第五十七回的“总评”有言:“孔明吊公瑾之后,忽然遇着庞统,与庞统见曹操之后,忽然遇着徐庶,正复相似。前是将徐庶放去,此是将庞统引来。一样文法,两样局面,真叙事妙品。”既如此这般指出其运用了“一样文法”,又给予一番“叙事妙品”赞美。

在毛氏父子看来,“重复”并非为文之大忌,特别是那些“相类而相反”叙事中的“一虚一实”或“一详一略”情景,还能传达出“奇妙”效果。如第二十回“总评”指出:“董承前曾拒催、汜以救驾,今若能诛曹操,是再救驾也。马腾前同韩遂攻催、汜曾受密诏,今同董承谋曹操,是再受诏也。前之救驾是实事,而后之救驾是虚谈。前之受诏用虚叙,而后之受诏用实写。一虚一实,参差变换,各各入妙。”对小说分别叙述的前后两场“救驾”与“受诏”,毛氏父子进行了“虚实”区分,并称赏了其“参差变换”之妙。另外,第二十一回有评曰:“前文曹操破吕布却用实写,此处袁绍破公孙都用虚述。一详一略,皆叙事妙品。”第二十八回针对小说所写周仓配将裴元绍被赵云刺死几句文字而评曰:“关平为养子,有不必随行之关宁以陪之;周仓为前将,有不得随行之裴元绍以陪之。一虚一实,天然奇妙。”第五十九回有评曰:“蒋干在周瑜帐中所听之语是虚,今马超在韩遂帐前所听之语是实。一实一虚,前后遥遥相映。”对一系列如此“虚实交错”的“重复”叙事,毛氏父子皆给予“叙事妙品”“天然奇妙”“遥遥相映”等赞美。

当然,《三国志演义》如此高频率涌现的叙事“重复”是否都能做到“相映成趣”?这是值得质疑的,因而有的评点者并不买账。题名李贽者在一百十二回曾有这样的评语:“读演义至此,惟有打盹而已,何也?只因前面都已说过,不过改换姓名重叠敷演云耳,真可厌也!此其所以为《三国志演义》耳。一笑,一笑。”按说“重复”叙事容易流于套话,有陷入老生常谈、陈词滥调、陈陈相因的风险,但只要操作得当,便可实现意义增殖,从而给读者以趣味。无论是毛氏父子对“相因”叙事的夸赞,还是米勒对“重复”叙事的津津乐道,都是看重这一点的。

三、毛氏“重复”叙事理论也曾关注衍生意蕴

眺望西方“重复”理论,我们注意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本是米勒“重复”理论立论的基本诉求。回看毛氏父子关于“重复”叙事的评点,也曾在这个向度上做过努力。众所周知,《三国志演义》的故事叙述秉持某种因果理念,往往将人际关系归结于机缘,将是非成败归结于命数,乃至后人将其改编为《三国因》。所谓“重复”,无疑主要是指结构文法的前后相因袭。另外,“因”还蕴含着因果之意。毛氏父子在强调文本文法的前后因袭的结构之妙的同时,还对其赋予的文本新意予以揭橥,并对这种文法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予以追踪。在这个意义上,毛氏“重复”理论也可以命名为“相因”理论。

说起来,文本内部的“重复”事实上是一种艺术“强化”,颇能给人以“应接不暇”感。对此审美效果,毛氏父子也每每予以指出。如在第六十一回“总评”中,他们赞美曰:“英雄一生出色惊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传为美谈。今偏不止一番,却有两番,则子龙之截江夺阿斗是也。美云长者,但称其单刀赴会,而不知已有油江赴会一事以为之前焉。美子龙者,但称其长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夺主一事以为之后焉。尝历观前史,求其出色惊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应接不暇如《三国》者乎?”的确,小说为对赵子龙、关云长大加溢美,前后叙述了两篇框架基本相同的故事,诚为“鲜花着锦”之笔。为强化“前后相映”“遥遥相对”等审美效果,也为强化其“尊刘贬曹”等正统思想,毛氏父子还别具匠心地对原小说文本进行了一些改动。如为映照前文所叙刘备“檀溪跃马”,后文在叙及赵云“长坂坡救主”时,便将原文中的“背后张郃赶来,赵云连马和人颠下土坑。忽然红光紫雾从土坑中滚起,那匹马一跃而起”几句,改为“张郃挺枪来刺,忽然一道红光,从土坑中滚起,那匹马平空一跃,跳出坑外”,通过突出一个“跃”字坐实了与“檀溪跃马”叙述的呼应,等等。如此一来,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前后文字便协调于“相类”框架之下,凸显了叙事的“相因”性。

在前后“重复”叙事的实施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的诸多行文并没有停留在话语重复之“术”

的层次,而往往借助“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等“天理循环”以及“因果报应”等观念,使之包含某种因果逻辑的“叙事之道”。对此,毛氏父子多有感悟与感叹。如由第十回所叙曹操阖户遭人劫杀,毛氏父子联系到曹操杀吕伯奢全家,指出其报应不爽。与此相关,小说叙述了至少三十余场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报恩”或“报仇”。虽然这些叙事所包含的“报恩”或“报仇”的内容和性质有所不同,但所叙“报恩”或“报仇”方式以及结果却多有“雷同”和“重复”,尤其是皆或多或少地含有恩恩怨怨、冤冤相报等宿命色彩。对通过如此“重复”叙事所寄寓的“叹往伤今”之情以及“往事不堪回首”的浩然长叹,毛氏父子心领神会。如毛氏父子第三十二回“总评”指出:“观鸟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楼之焚;观审配之死,令人追念耿武、关纪之死。一冀州耳,韩忽变而为袁,袁忽变而为曹。其始也,馥失之,瓚争之,而绍取之;其既也,谭失之,尚争之,而操取之。兴亡弹指,得丧转盼,夺人者,曾几何时而为人所夺。读书至此,为之三叹。”的确,由后文出现的行文“重复”,读者自然会联想到前文所叙之雷同故事,进而思考其中蕴含的“夺人者为人所夺”之道,不免扼腕叹息。更有甚者,针对小说第一〇九回所叙“发曹芳魏家果报”一段叙述,毛氏父子接二连三地运用了十个“令人追想”“令人追念”等评语来突出阅读行文“重复”片段的感染力和伤感情绪。兹再节录一段文字如下:

司马师看毕,勃然大怒曰:“原来汝等正欲谋害吾兄弟,情理难容!”遂令将三人腰斩于市,灭其三族。【令人追念董承等七人遇害之时。】三人骂不绝口。比临东市中,牙齿尽被打落,各人含糊数骂而死。【令人追念吉平截指之时。】师直入后宫。魏主曹芳正与张皇后商议此事。皇后曰:“内庭耳目颇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令人追念伏后、董妃语。】……乃指张皇后曰:“此是张缉之女,理当除之!”芳大哭求免。师不从,叱左右将张后捉出,至东华门内,用白练绞死。【令人追念华歆破壁取伏后时。】^①

这段文字所叙司马师篡位之景象,有如前面所叙当年曹操欺凌汉献帝之景象。读着这类“重复”叙事的文字,回想小说前文所叙曹操当年是何等飞扬跋扈,再看这里所叙而今其后人又是何等沦落悲惨,读者总是会生出盛衰无常、因果报应之叹。这种“令人追想”效果,正是似曾相识、触类旁通所致,足以令人回味无穷。

对《三国志演义》那些政权争夺及相互更迭之“重复”叙述的衍生意蕴,毛氏父子也曾予以多方面发掘和探讨。如在第一二〇回(也就是在小说终卷)的“总评”中,他们作了这样的概括和总结:

前卷晋之篡魏,与魏之篡汉,相对而成篇;此卷炎之取吴,亦与昭之取蜀,相对而成篇。而前卷于不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类者,见报应之不殊也;此卷于极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见事变之不一也。……比类而观,更无分寸雷同,丝毫合掌。凡书至终篇,每虞其易尽。有如此之竿头百尺,愈出愈奇者哉!^②

在此,毛氏父子慧眼独具地看到了《三国志演义》之各式“重复”以及由此造成的“相对而成篇”构架,兜出一大批“相类而相反”式的“特犯不犯”叙事单元,并对其进行细细“比类而观”,从而揭示出其中寓含的“报应不爽”等宗教哲理,以及所蕴涵着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神秘莫测感。

不过,受到时空视野限制,毛氏父子没有做到像米勒那样注意从作者视角探求各种文本之所以出现“重复”之因,因而对“重复”叙事之衍生意蕴的发掘也是十分有限的。相比而言,米勒集中探讨了《吉姆爷》的结构颠覆之于康拉德的人生哲学,《呼啸山庄》之重复的“神秘莫测”之于艾米丽·勃朗特的奇特经历、《亨利·艾斯芒德》之重复的“历史视角”之于萨克雷的讽刺风格、《德伯家的苔丝》之“作为内在构思的重复”之于哈代极端的怀疑主义和沉重的失落感、《心爱的》之“被迫中止的重复”之于哈代的艺术观、《达罗卫太太》之“使死者复生的重复”和《幕间》之“作为推断的重复”之于伍尔夫的女性作家的心态等一系列问题。在米勒那里,似乎各种“重复”叙事的出现皆有其机

①(明)罗贯中著,(清)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三国志演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29页。

②(明)罗贯中著,(清)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三国志演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29-1330页。

缘,都可以从作者人生经历或审美思想等因素那里找到合乎情理的答案。通过如此镜照,我们便可清晰地看出毛氏父子“重复”叙事理论的缺失。另外,它对“重复”叙事修辞的关注也是不够的。如在叙述围剿战争故事时,小说至少八次运用了“围得铁桶相似”一语。就连此类“重复”修辞语,毛氏父子也并没有纳入法眼。

毛氏父子对《三国志演义》“重复”叙事文本的“比类而观”面向传统文化,并对其衍生意蕴有所关注。

四、毛氏与米勒之“重复”理论的跨时空镜照

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氏父子的“重复”叙事理论围绕“相似”“相类”“相因”等关键词展开,是中国古式“重复”叙事理论的典范。可通过概括、总结、激活,使之服务于当今中西合璧的“叙事”美学建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对毛氏父子“重复”理论予以特别关注也得益于J.H.米勒“重复”理论的启发。通过中国三百多年前出自毛氏父子之手的叙事理论与西方风行的米勒“重复”理论的跨时空镜照,我们可以加深对本土相关理论的理解,并服务于当今文论体系建设。

从理论渊源看,毛氏“重复”理论与米勒“重复”理论都有着较为雄厚的基础。围绕相雷同的题目,小说作者与评改者却做出同中有异的文章,形成文法的千变万化。这本是金圣叹“犯而后避”理论的关注点。受此影响,毛氏父子所谓“相类而相异”其实就相当于“犯而后避”。在《读三国志法》中,毛氏父子如是说:“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由此可清晰地见出二者的继承关系。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既能“以例释义”地指出这部小说中的“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又以“随文评点”的形式识别出许多“重复”片段。如第二回写鲁达“正听到那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张大哥,你如何在这里?’拦腰抱住,扯离了十字路口”,类似文字在第四十二回叙述李逵故事时再次用到:“李逵在背后听了,正待指手画脚,没做奈何处,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拦腰抱住,叫道:‘张大哥,你在这里做甚么?’”金圣叹在此夹批曰:“极似鲁达至雁门县时。”挑明了二者之间的“重复”关系。再如,第四十三回写石秀拜潘巧云之“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动作与第二十三回写武松拜潘金莲之“当下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动作,叙述语颇为相似,金圣叹评曰:“与武松一样人,与武松一样事,与武松一样文章,不换一字。”小说文本之如此“重复”还有不少,大多被金圣叹看在眼里,并以“犯笔”评之。有鉴于此,毛氏父子将此理论推而广之,大加应用。如第四十回“总评”是如此“以例释义”的:“刘景升家难,与袁本初家难,正自仿佛,而写来却无一笔相类者。”“求一笔之相犯而不可得。”^①在毛氏父子看来,刘表与袁绍之“家难”属于同室操戈性质,两家兄弟在父亲死后,都是其中有一人投降了曹操,情节大致是雷同的;然而具体情形却又不同。毛氏父子将这些叙事的复杂变化归结为历史的原生态。非但看到了其“重复”,而且看到了其“重复”中的“变化”;不仅将“事件的重复”视为“天然变化之事”,而且还将“话语的重复”说成是“变化之文”,并指出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受前者的左右。题目“相仿佛”,而叙事又“不相类”,用“变化之文”叙述“相仿佛”之事,求得“不相犯”的叙事效果,正是一种令人感觉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的美感。相对而言,米勒的“重复”理论渊源更广,他不仅集西方新批评、意识批评及解构批评的三种文学批评方法之优长,而且根据其本人所提到的线索,我们还发现他还吸取了由维柯到黑格尔和德国浪漫派,由基尔凯郭尔的“重复”到马克思,到尼采永恒轮回,到佛洛伊德强迫重复的观念,到乔伊斯《为芬尼根守灵》,一直到当代论述过的雅克·拉康、吉尔·德鲁兹、米尔恰·伊利亚德和雅克·德里达等“重复”的理论家,因而对各种“重复”所可指涉的隐喻、反讽、戏仿以及在文学与历史、政治、伦理等层面的关系中所形成的潜在意义都有所阐发。尤其是其关于“反讽”“隐喻”“张力”“意象”“戏仿”的阐发,是毛氏“重复”叙

①(明)罗贯中著,(清)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三国志演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4页。

事理论所不具备的,对我们当今的文学研究和理论建设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特别是,无论毛氏父子,还是米勒,他们的“重复”叙事理论都基本立足于“文本”,尤其是借助经典文本的“细读”而展开,偏重结构功能的发掘。毛氏“重复”理论生发于古典小说《三国志演义》评点,关于“重复”叙事的结构意义和审美效果,毛氏父子在第九十四回的回前“总评”是这样说的:“读《三国》者读至此回,而知文之彼此相伏、前后相因,殆合十数卷而只如一篇、只如一句也。……文如常山率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岂非结构之至妙者哉!”前后映照,首尾呼应,正是“结构之妙”的突出标志。有时,为了突出《三国志演义》“重复”叙事的衔接功能,毛氏父子还用“一线穿”这一术语评之。第八十一回之“总评”指出:“李意之见先主,与紫虚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虚则有数言,李意止写一字;公明惟凭卦象,李意自写画图,极相类又极不相类,而皆为后文伏笔,令读者于数卷之后,追验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线穿却也。”顾名思义,所谓“一线穿”,是借编织技术术语来比喻小说结构的严密。毛氏父子如此热衷于评批小说中的“相似”“相异”“相反”等各种“重复”叙事,看重的是如此文本结构所拥有的“相映成趣”“延异变化”“虚实奇妙”等美学效果。而米氏“重复”理论则以《吉姆爷》《呼啸山庄》《亨利·艾斯芒德》《德伯家的苔丝》《心爱的》《达罗卫太太》和《幕间》等19至20世纪的七部英国经典小说为例而展开。关于文本内部重复,米勒给出的例子是哈代小说《苔丝》中一再出现的与红色有关描写的词语重复,以及该小说关于苔丝受辱的经历、季节的轮换叙述的不断重复。关于文本间际之“重复”,米勒重点阐发了哈代的《苔丝》与其另两部小说《心爱的》《无名的裘德》在主题和形式上的相互呼应。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中明确提出把“重复”叙事形态一分为三:即“言语成分的重复: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事件或场景在文本中被复制着”“重复其他小说中的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前两种属于“文本内部重复”,后者属于文本间际之“重复”。其“文本”立场以及偏重修辞、结构阐释的态度是明显的。米勒还强调指出:“在一部小说中,两次或更多次提到的东西也许并不真实,但读者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假定它是有意义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在各种情形下,都有这样一些重复,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多样化的关系。”^①身处解构主义话语背景下的米勒特别注重“重复”叙事的“结构”功能,自然是理解的。

与米勒“重复”理论相镜照,早先几百年诞生的毛氏父子“重复”叙事理论主要聚焦《三国志演义》文本内部,同样也曾放眼于文本外部,关注与其他前文本的关联。他们曾多次指出,《三国志演义》除了因袭《战国策》关于“秦、楚、齐”三国之间微妙而富有张力的叙事,还特别多地因袭了《左传》,大至承袭《左传》详于叙述前因后果而略于叙述战争过程的战争叙述经验,小至个别语句等细枝末节的沿用。如第十三回写道:“渡过帝、后,再放船渡众人。其争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对此,毛评曰:“《左传》述晋败于邲之役,有云‘舟中之指可掬也’。此将毋同?”当然,关于“相类而相异”之“重复”,毛氏父子也善于从“跨文本”性视角予以评说。如第二十回“总评”又指出:“赵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顺逆,曹操以射鹿验众心之从违,奸臣心事,何其前后如出一辙也!至于借弓不还,始而假借,既且实受,岂独一弓为然哉?即天位亦犹是尔。河阳之狩,以臣召君;许田之猎,以上从下:皆非天子意也。然重耳率诸侯以朝王,曹操代天子而受贺,操于是不得复为重耳矣。”毛氏父子由曹操“射鹿验从违”,联想到赵高“指鹿察顺逆”;由曹操“代天子而受贺”,联想到重耳“率诸侯以朝王”,一五一十地指出了《三国志演义》与《史记》叙事之关联;而后指出了其差异。第二十四回写道:“操大声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战栗曰:‘朕实不知。’”对此,毛评也说:“尝读《左传·周郑交质》篇‘王曰无之’句,为之一叹;今献帝‘朕实不知’四字,正复相似。”毛氏父子注意到了这些因袭《左传》的段落和语句。毛氏父子对《三国志演义》叙事与《史记》叙事的“重复”关系比照还有多处,如第十八回“总评”说:“将在谋而不在勇,贾诩之知彼知己,决胜决负,斯诚善矣。至于郭嘉论

①[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袁、曹优劣,破曹之疑,不减淮阴侯登坛数语。”毛氏父子从小说所叙述贾诩、郭嘉的言论,联想到《史记》所记淮阴侯韩信的登坛拜将之语,指出二者之间的沿袭痕迹。第四十一回“总评”又说:“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军、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第七十二回“总评”亦言:“汉高之破项王,赖有彭越以扰其后;先主之破曹操,亦有马超以扰其后:前后殆如一辙也。”第八十三回叙述阚泽推荐年少陆逊为大将军,原文是:“阚泽曰:‘古之命将,必筑台会众,赐白旄黄钺、印绶兵符,然后威行令肃。今大王宜遵此礼,择日筑台,拜伯言为大都督,假节钺,则众人自无不服矣。’”毛评曰:“如萧何荐韩信故事。”这些评语皆指出了《三国志演义》文本与《史记》文本之间的血脉关联。由此可见,对《三国志演义》因袭《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先期文本的情形,毛氏父子尽量予以识辨和鉴定。可以说,就“重复”理论的分类和观察面而言,毛氏“重复”理论与米氏“重复”理论都注意到小说行文除了文本内“重复”,还有一种跨文本或兼跨文本内外的“重复”。

总而言之,在《三国志演义》评点中,毛氏父子善于借助“比类而观”式的联想阅读去发现、辨识小说文本叙述的“重复”,并强调其“相因”性,从而形成关注前后文本映照以及文本与文本因袭的叙事理论。当然,身处几百年之前的毛氏父子的“重复”叙事理论尽管对文法、效果、哲理等方面面均有所触及,但毕竟尚停留在“随文评点”“以例释义”的观念层次,缺乏系统化的理论高度;而米勒那套诞生于现代“解构主义”背景下的“重复”叙事理论也留下了过于偏重抓取小说文本细枝末节大做文章而对文本“重复”背后的文化意蕴挖掘不够的缺憾。站在“为我所用”立场,我们可以采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西文论的融通化合”等策略来补救毛氏与米氏各自“重复”理论的美中之不足,从而使这种关注文本内外相似的“重复”理论更具高度和应用空间;若从“利他主义”看,我们亦可将毛氏“重复”理论中的“相映成趣”等叙事效果理论送去,以供西方文论家们借鉴。

(责任编辑:李亦婷)

Mao Zonggang and His Father's "Repetition Theory" about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rough Analog Perspective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Li Guikui

Abstract: Through "Analogy Perspective", Mao Lun and his son Mao Zonggang identified and interpreted the "repetition narration"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put forward "contrast and complementary" "no contrast and complementary" "similar and iconic" "no similar and iconic" and other interrelated forms. We can be summarized as "similar and similar" "similar and different" "similar and contrast". In the view of Mao's father and son, the three kinds of "repetition narration" form can write freely and well, not only with "remote phase match" and "echoe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but also have the "complement" "change" "wonderful" aesthetic effect. In addition, they can also from the causal concept derived meaning of the novel "repetition narration" to explain. Compared with "Repetition theory" popular in the West today which put forward by American Mille, Mao's theory of "Repetition" for hundreds of years earlier, looking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activation to carry forward. The two can be formed in the light of their own tradition, based on the classic text,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functional aspects of the time and space. We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by giving service to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Keywords: View of Analogy; Similarity; Repetition; Structure; Narrative Theory; Mirror Image